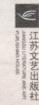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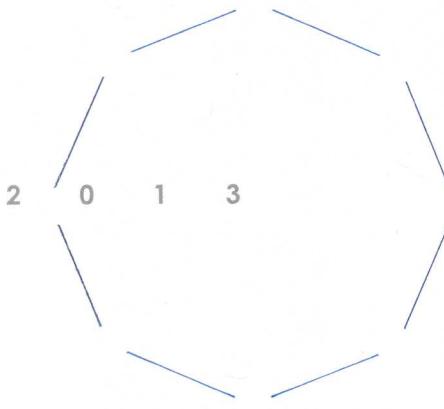
中 国 好 文 学

# 最佳纪实文学

主编 — 丁晓原



江苏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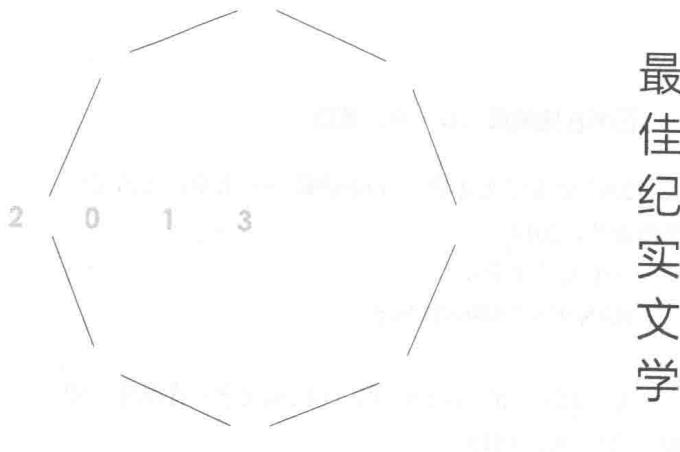


The Best Chinese Literature

总主编 — 李敬泽

中 国 好 文 学

# 最 佳 纪 实 文 学



总主编—李敬泽 主编—丁晓原



## 图书在版编目 (C + P) 数据

2013 最佳纪实文学 / 丁晓原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中国好文学)

ISBN 978-7-5399-7371-5

I. ①2… II. ①丁…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书 名 2013 最佳纪实文学

编 者 丁晓原

责 任 编 辑 赵 阳 王一冰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371-5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报告文学,回到非虚构叙事本位(序)

丁晓原

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因此,随着时代生活的变迁,它也应该与时俱进。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基因,是这一文体醒目的胎记。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看,它产生在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而新闻又相对不开放的时期,以文学的方式报道新闻人物和事件,以跨文体的新闻性的传输,获得了这一文体的特长。但在当下行进中的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与自媒体的便捷,使报告文学原有的新闻性优势已不复存在。另外,报告文学曾是“在野者”的文体,或者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其批判性、启蒙性的文体功能尤为显见。但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不仅主体的写作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现实社会也不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时代,报告文学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其时的思想启蒙,这是特殊时代所赋予的报告文学的特殊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已成为现时代的一个“天问”。这是一个非启蒙的时期。同时,现在的思想者主要并不在报告文学界内,从整体上说,报告文学家的思想能力普遍偏弱。因此,原来基于深刻精警的思想言说而形成的政论性,也不再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而且新世纪新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过去主体激扬文字式思想表述,而更期待以自己的思考参与作品内蕴的解读。这样,报告文学曾经独特的主题阐释的优势也并不显见了。

没有了新闻性和思想性优势的报告文学,是否意味了这一文体的消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像杰克·哈特所说,“读者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兴趣高涨”,“虚构文学在美国读者心中的地位日趋下降。根据《大西洋杂志》的报道,在1982到2004年间,在美国阅读小说、戏剧和诗歌的读

者人数比例下降了十个百分点，跌至历史的最低点 47%，而非虚构文学的读者却在不断扩大。”<sup>①</sup>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写作实况，也表明弱化了新闻和思想优势后的这一文体，依然具有它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逻辑。这种合法性逻辑源于变幻丰富复杂的现实。现实之种种，超出了许多虚构文学想象的空间，它成为写实文学不竭的书写资源。现实的存在需要写实的文体对其实录。并且，读者对现实真实故事的心理期待，也为此类文体的发展，开拓着需求市场。故事不仅有着明显的社会属性，而且还有“故事的生物学性”，“很难想象叙事不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我们视自己的生活为一种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他人的叙事如此着迷。”<sup>②</sup>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内在本性就是它的非虚构叙事性。无疑，它的存在可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和读者的需求。因此，很显然，现在讨论报告文学的话题，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报告文学如何回到非虚构叙事本身，建构具有这一文体特质的叙事美学。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叙事艺术，探寻它对于读者召唤性魅力的生成，这对报告文学而言不是一个虚拟的命题，而是极具当下针对性的务实的重要课题。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最近十年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如《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寻找黛莉》《发射将军》《千古一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解放战争》《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中国水利调查》等，无不以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对深有意味的故事作具有作家个人色彩的讲述，显示着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场域中新的发展趋势。像赵瑜的《寻找黛莉》运用连环悬念设置的叙事策略，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以双声叙事构篇等，作家的叙事自觉生成了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在本位的意义上，彰显了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价值，也表示了非虚构作品在艺术性的制备方面，与虚构性写作一样，作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① 【美】杰克·哈特著：《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前言》，第 1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② 《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第 4 页。

报告文学的叙事本位，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报告文学的叙事本位，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类以叙事的方式反映对象世界，根据叙事主体与客体的不同结构关系，大致有非虚构、虚构和虚实混合等三种情形。无疑，报告文学文本对于客体的表现应是非虚构的。正是这种非虚构性内置了报告文学的本质属性，同时它也造成了这种写作的有限性。作家不能虚构写作对象，只能在客观实在的框架内呈现真实的人事物景，这是报告文学不可逾越的写作伦理。因此，如何在非虚构的有限性中，获取故事叙说的能动性，这是报告文学叙事必然会面对的问题，也是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两点，一是从外在的客观真实到主体写作中的客观真实，前者大于后者，并且制约着后者的生成，因此，从本源看，报告文学的叙事是一种非虚构的选择性的叙事，作者对于故事意义、意味的认知以及基于认知所进行的选择，对作品的写作至关重要；二是，作家的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不是照相式的机械的被动的真实，其间定有作家的主体性介入。事实上，这种主体性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作为写作发生的前提，作者首先需要从林林总总中选取特定的写作对象，选择需要发现，需要作者独具眼光，而发现和眼光的内里是作者的心智能力。不同于以往报告文学的写作更多地依凭题材本身的新闻性，作品普遍地采用宏大叙事报告重大题材的模式，因此作品的新闻性其外在往往并不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落泪是金》《马家军调查》等表现为事件的突发性、题材的初始性和信息的揭秘性，而更多地选择软性新闻题材进行写作。

所谓“软性新闻题材”，就是题材表面并不具有显然的新闻性、重大性和陌生化，写作价值需要作者对题材的“软性”作出富有深度的开发才能实现。这里“软性”开发就显得特别重要。傅宁军是新世纪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大学生村官》《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更多地借重于人物故事集纳后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题材的“硬性”新闻性获取写作价值，而《此岸，彼岸》则以善于开掘“软性新闻题材”而取胜。作品以著名的“金门炮战”作为故事叙事的背景和重要端点，书写两岸关系发

展的新篇章，正如傅宁军所说，“我想记述的，并不是军史研究话题，因那些话题引发的浩浩专著，早已蔚然大观。我作为一个作家，更关注于普通人的命运。”作者从战争与和平的大历史中，设置民间小叙事，以此开掘历史褶皱中具有史意的存在，表现历史进程所呈现的景致，酿造的滋味。当年炮战是“仇家”、“冤家”，后来时运变迁，通商联姻，成为儿女亲家。作品特别注意挖掘叙事客体中具有戏剧性乃至喜剧性的因素，加以细节化的推衍呈现，使作品既真实地再现了大历史的演进，更增强了叙事的意味情味和趣味。“顶尖的非虚构作家都是奇闻趣事的写作高手。在他们的故事中，小的叙事弧线使故事变得更加有趣，无情地牵扯着读者的心。奇闻趣事对于作者表现人物特别具有说服力。”<sup>①</sup>“每一位出色的故事作家都能不断发现生活的‘小小真相’。并不是每个细节都能帮助构建场景，但是好的细节不但能够搭建出展示情节的舞台，而且还能阐述故事的主题。”<sup>②</sup>《此岸，彼岸》多的是“奇闻趣事”和“小小真相”。大陆的陈菲菲和金门汤丽珠、许冰莹，当年各司其职，是进行播音宣传战的对手，后来陈菲菲和汤丽珠在电视专题片《血脉》中有了特殊的“会面”。许冰莹在“退休之后，又到厦门大学攻读中医专业，成为全校最年长的本科学生。”这样的叙事组织，尽显历史的大意和人生的况味。

报告文学叙事品质的建构，如同矿工选矿开采冶炼。可以说矿藏的品质决定着提炼物的品质，但矿石本身并不就是金银等贵金属，它需要进行去粗取精等的提炼提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规定了叙写的对象客体内在本有品质的意义。因此将对象客体真实地文学地转化为非虚构文本，就成为写作品质获取的关键。从报告文学叙事发生的实际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作者能否有效地完成对于有价值叙事对象的内化。通常而言，新闻写作是一种基于采访的写作，我们这里所言的内化，包含

① 《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第 87 页。

② 《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第 95—96 页。

了采访的义项,但其意远不止于此。采访是一种限时工作,而且作者的立场往往是外在旁观的,因此难得人事物理的肌理和质地。而内化强调的是主体对于所叙客体的进入、沉潜,由此作者获得切实的感受、独特的感悟,进而达成一种会物于心、主客相得的融合之境。这种内化意近杰克·哈特所说的“沉浸”,“作者要身临其境地去观察,去倾听,去嗅闻,去触摸。这就是叙事新闻报道的标志性方式——沉浸式报道。”<sup>①</sup>在我看来,能否真正内化或沉浸,是报告文学作家能否在非虚构叙事的有限性中,获得写作自由自主的能动性的前提和关键。普通采访与自觉内化是作为新闻的报告文学与文学的报告文学不同的生成机理之所在,对于题材的充分内化,是报告文学获得表达个性的基础,而叙事的个性化正是报告文学之谓文学的要素。近年推出的陈庆港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可以说明内化之于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意义。作者不是报告文学的职业写作者,他的写作是生活赋予的一种责任,是生活发酵后升腾的力量使然。作者以十年之久跟踪访谈农户,用的是定点式的田野调查的作业方式。这样作者就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感受并呈现对象的生存状态和心态,作品也就有了真实生活的质地和质感,展示所谓原生态的存在。近年来报告文学饱受诟病,一些非虚构写作倡导者甚至主张取消报告文学,以非虚构而代之。而一些坚定的报告文学文体守望者,无法接受,争论一时纷然。其实报告文学文体的存在是时代的需要,读者的需要,它不可能消亡。我们不能因为报告文学“有病”而断然宣布其“不治”。非虚构是文类而不是文体,它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是类与体的关系,我们不能一概地以类代体。这是常识。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守望报告文学的人士,也不要感情用事地拒绝非虚构写作中的合理因素。这不是什么暧昧,而是有益于报告文学文体优化的建设之策。非虚构写作强调回归日常生活取材,强调叙写个人的亲历亲验,强调呈现对象的本真存在的叙事美学等,顺应了报告文学弱新闻性、弱启蒙性等变化的趋势,也顺应了读者对于此类写作接受的新变化。因此,其中的一些要义是值得报告文学写作借取的。我们不是说,报告文学要一律

<sup>①</sup> 《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第151页。

地“非虚构式”，但是它可以成为报告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基于这样的认知，本年选收录了梁鸿的《出梁庄记》、林那北《宣传队》和丁燕《工厂女孩》。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正是行进中的报告文学的典型作品，作者是否接受报告文学的称名已不重要。文学评论家梁鸿部分地转型为写实作品作家，影响超过了她的评论家身份。《出梁庄记》是其《梁庄》的后篇。梁庄是梁鸿生于斯、长于此的故乡，《梁庄》可以说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种十分典型的乡土叙事，滋味杂陈。《出梁庄记》也可以说是农民工记，所记为两亿多中国农民工的缩影，是我们观照现实中国无法漠视的镜像。林那北的《宣传队》是读者穿越现时进入“文革”的一个颇有意义的文本。宣传队其队也小，但命意甚大，作者队员的经验书写，记写了特殊年代的特殊的政治氛围、文化生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个人史中折射出大历史的气息。丁燕的《工厂女孩》，所写也是“女工记”，但不同于其他写作者的是，丁燕自己曾是“工厂女孩”，作品不是一般的采访记，而有着自述的叙事特质。这些作品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特殊关联，使主体对于客体的内化有了某种天然的契合。《出梁庄记》《宣传队》《工厂女孩》等是一些复义文本，它们不止是非虚构文学，也是社会学、历史学等的手稿。

普利策特稿写作奖得主乔恩·弗兰克林有《为故事而写作》，其间对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中“故事”作了“定义”：“当人物遇到错综复杂的情况，而他又不得不面对和解决时，行动就发生了，故事正是由一连串这样的行动所构成的。”<sup>①</sup>报告文学是对具有现实性的“故事”的叙事，其叙事魅力的生成与丰富、复杂、曲折、多义的故事置备密切关联。相比于新闻的相对简单、单一，报告文学需要讲述更多“错综复杂”的故事。在新闻弱化的背景中，报告文学的写作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对于已知存在的深度挖掘和故事性再现。在深度细化和故事性还原中建构报告文学的叙事召唤力。年选所选的《一枚铺路的石子》是一篇典型的“主旋律”作品，

① 《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第6页。

但这一作品没有此类写作常见的纯化、物化和新闻化，于短篇中呈现人物的多样与丰富，设置了“他是孩子的‘人生导师’，拨亮一盏盏希望的灯”、“他自称‘文学迷’，对民族文化爱得深沉”和“他开辟的一条条‘兰辉小道’通往百姓心间”等三个章节，以具体的事例、生动的细节，真实地凸显主人公“甘于做一枚‘铺路’的石子，垫高他人的身躯，畅通前方的路”的师者风范、“以诗的品格，以歌的旋律”，“在精神世界里徜徉”的才子风采和“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摸着良心行事，尽力地张大自己的双臂，呵护曾经泪水纵横的父老乡亲”的赤子情怀，写实写活了人物丰富的个性，并且以真切感人的人性充实了主旋律作品单一的先进性。何建明的《江边中国》是苏南叙事中的新作。“江边”，这一叙写的具体对象与其存在的宏大背景“中国”之间，建构起了一个充满叙事张力的意象时空。《江边中国》“江边”与“中国”之间有机的组构，调制出作品别致可人的叙事魅力。宽幅的叙事与细密的言说，故事主干的强化与关联性材料的穿插等，将作品组织成既有宏阔大气又有精致诗美的立体的、表意丰富的非虚构艺术体。阅读《江边中国》，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写作进入了某种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来自何建明对报告对象的熟知，来自对故乡的深情，对吴栋材等永联人的崇敬。在作者的笔下，吴栋材不是一般的叙写对象，而是可敬可爱的“父辈”。作者的写作更多的不是一种采写，而是一种生命的投入和释放。作者既写吴栋材这一代父辈的创业的业绩，更写他们特有的精神品格。父辈勤劳、执着、智慧而不乏乡村世界的野性。作者写人不作单面关照，力求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吴栋材是江边汉子、伤残军人、学徒铁匠和新时代的创业者，人物的主导性格影响着人物的人生，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吴栋材又是普通的人，也有普通的人性弱点。由《江边中国》中的吴栋材，我想好的报告文学应该像好的小说一样，要为读者雕塑多面的、变化的“圆形人物”。

年选，并不能任由编者一人兴趣偏好所取，面对林林总总的作品和无定的读者，基于主导的兼收可能是一种合适的策略。因此本年度的年选既有《国家的儿子》这样的颂歌，也有《“囚犯”的救赎》《呼伦贝尔的忧伤》等的问题报告；既以现实再现为主，也有《悲壮三门峡》这种历史叙

事；既有宏大庄严的国家叙事《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也有《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小偷回忆录》诸类杂色题材。凡此种种，摄照现实的多副面孔，反映多样的中国故事。选本有如超市，读者各选所需吧。

一  
“晴天霹雳”与“惊悚”，我总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词，各自都有相应的文学作品类型。  
对前者，“惊悚”可能更准确些，“晴天霹雳”则只能作为后者的修饰语。因为前者的产生，有赖于读者的恐惧心理，而后者则不必如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惊悚”就是低俗的、不健康的，而“晴天霹雳”就一定是高雅的、健康的，但二者却常常同属于同一个作家之手，且往往由同一种情绪引起，这就说明，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拿我来说吧，我写过不少“惊悚”作品，也写过不少“晴天霹雳”，但它们的创作背景却常常是相同的。只是，有时候“晴天霹雳”是由于看到一个新闻事件，或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惊悚”则是由于看到一些神秘的、离奇的、恐怖的事件，或是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等等，所以，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属于“恐怖”一类的文学类型，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惊悚”和“晴天霹雳”的区别，还在于它们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上，前者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而后者则主要是在民间，通过口头传说、传统节日（如端午节、重阳节、腊月二十三）的习俗、庙会、集市、广场等场所，通过民间艺人、说书人、唱戏人、念书人等讲述者之口，通过各种口头形式传播出来的，这样，“惊悚”和“晴天霹雳”便有了很大的区别。

就拿这次的《惊悚》来说吧，它就是由一个普通人，即一个名叫李坤的中年人口口相传的。他最初在一家公司打工，后来辞职自己开公司，但生意不好，负债累累，直到去年年底，他的公司倒闭了，他才不得不回家乡，靠种田为生。今年夏天，他在村头的一片稻田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已经腐烂，面目全非，只留下一具骨架，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连衣裙。李坤非常害怕，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自己偷偷地埋葬在自家的地里。从此以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梦到那具女尸，吓得他不敢睡觉，只能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直到天亮才能入睡。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李坤终于忍不住向邻居们诉苦，大家得知后都非常同情他，纷纷劝他报警，但他觉得报警后可能会牵连到自己，所以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被那具女尸咬住喉咙，无法呼吸，吓得他惊醒过来，浑身汗毛竖起，心惊胆战，连呼一口气都困难。第二天早上，他终于鼓起勇气，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很快赶到现场，将尸体带回公安局进行DNA比对，结果证实，这是一起谋杀案。李坤因此被关进了监狱，等待审判。

# 目 录

报告文学,回到非虚构叙事本位(序) .....	丁晓原( 1 )
江边中国 .....	何建明( 1 )
国家的儿子 .....	黄传会( 35 )
一枚铺路的石子 .....	王国平( 50 )
此岸,彼岸 .....	傅宁军( 69 )
出梁庄记 .....	梁 鸿( 99 )
工厂女孩 .....	丁 燕(135)
“囚犯”的救赎 .....	王敬东(174)
呼伦贝尔的忧伤 .....	陈启文(209)
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 .....	涂 俏(233)
牙香街 .....	李青松(267)
“中国式”家庭农场 .....	弓 壳 商中尧等(286)
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	张雅文(298)
悲壮三门峡 .....	靳怀椿(334)
宣传队 .....	林那北(375)
小偷回忆录 .....	陈歆耕(419)

# 江边中国

何建明

197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有一个人来到了长江边，于是“中国故事”便有了另一种新的开篇和新的版本……

还能回忆得起来这一年我们都在干什么？

这一年我在离开家乡从军三年多后有了第一次探亲的机会。两天两夜的火车，将我从湘西的一个导弹基地的工程兵部队驻地，拉回到了大都市上海。我清楚地记得，从上海回到我家共走了十二个小时，先是乘长途汽车，再搭轮船，然而是父亲和姐姐用自行车又把我驮回家。

现在这段路程，无论从上海的虹桥飞机场还是高铁车站出发，到我家都只需一个小时，因为现今有两条高速公路可以通到我老家，也不再需要更换几种交通工具，办厂的姐姐和妹妹家都有专职司机会将我迎送回府。

1978年末，中央召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那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然而1978年的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似乎都值得去浓墨重彩——

年初的1月5日，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代表团抵达美国华盛顿杜勒斯机场。TWA891航班降落，中国驻联络处主任、著名外交家韩叙把祖国的代表团接到绍汉姆酒店后，说：“大家一路辛苦了，晚上我给你们安排一家中餐馆吃顿饭。”

代表团的成员很惊讶：“这里还有咱中国人啊？”韩叙说：“是台湾人开的中餐馆。”

“台湾人？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去台湾人开的馆子吃饭！这一吃不知吃出啥毛病！绝对不能去！”团长、副团长皆是工业部门的部长、副部

长,他们都是“老八路”和“小八路”出身。

“就因为当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给国民党送了几次信,结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揪出来当作‘国民党反革命特务’,斗得够呛!我们再不能沾台湾人的边了!”代表团团长没给革命资格不相上下的韩叙面子,坚决拒绝道,“虽然出国前,外交部说到这儿后都听你的,但这件事上我要为全团负责。你得听我的。”

“那……”韩叙十分为难,说:“那我们只能去吃西餐了。”

“西餐都有些啥?”

“汉堡包、奶酪……”

“恶——”团长突然掏出手绢,转身吐了一地污秽物。“你,你千万别再跟我提汉堡包、奶酪了。这飞机上一路都是恶心的汉堡包和奶酪了……”

韩叙陷入窘境,说道:“那你们吃什么嘛?”

副团长用脚踢了踢了旁边的两只纸箱:“没事,部长让我们带了两箱麦乳精。”

韩叙笑了,说:“行吧。我刚来美国时,也主要靠麦乳精撑着肚子。”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知道麦乳精是啥东西,在1978年时,它可是我们全国人民都向往的美味食品。

这个代表团访美日期时间不短,到1月底才回国。一个多月后,中央专门召开会议,中央主要领导都参加并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一段激情的讲话,他说道:“我们搞了多年建设,深感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势必要解决能源问题。有了能源,机器才能转动起来,物质财富才能生产出来。中国因为‘文革’折腾了十年,我们各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过去我们落后,现在中央确定了在本世纪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急起直追,一天要做一个月的事情!”

国家落后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中央领导对此有极其强烈的共识。最着急和最想急起直追的人要算小平同志了,这一年七十四岁高龄的他,连续访问了缅甸、日本和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尤其是对日本和新加坡的访问,让小平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

“快!真的很快喔!”在日本的快速干线的火车上,小平坐在车厢里,

看着风驰电掣般的高铁，数次默然间发出一声声感叹。

在听了新加坡人介绍这个东方小国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后，小平紧紧握着李光耀总理的手，恳切地说：“中国比新加坡落后多了，希望你们帮助我们……”那目光里满是期待。

也是这一年的2月的一天傍晚。广东省东莞市虎门公社的沙角海边。

黑色夜幕下，几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咛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陆陆续续跨进岸边的一只简陋的机动船上。暗淡的月色斜照在海面，骚动的人群像起伏的海水汹涌着。船就要开了，岸上的女人、孩子和船上的男人们彼此开始呼喊起来，情景凄婉而悲壮。

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驶到岸边猛然停下。公社领导出现在人群面前。

这人社员们都认识到，叫黎桂康，是公社书记。

“不要走！大家不要走……你们不能走！”黎桂康的声音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了，尖而刺耳，而且沙哑了。

海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又很快出现反弹——短暂的沉寂之后是更大的喧哗与骚动，此起彼伏的人声完全淹没了公社书记的声音，甚至有人又蹦又跳着冲这位干部说“我们就是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你们不能走！千万走不得啊！走了你们就是……”黎桂康把“反革命”三个字吞到肚子里，又说：“我们这里也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相信我吧！真的会好起来的！”

“谁信！走——”

黎桂康急了，年轻的他一下从车上跳下来，欲冲到岸边的船上，但想不到的是那些女人和孩子还有老人们筑起的人墙竟然把他死死地堵在一边根本挨不到船边。

黎桂康使尽力气，就是不能动弹一寸。“你们，你们不能走啊……”他哭了，哭得泣不成声。

后来女人们也跟着哭了起来：“书记，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呀！我们

也不想孩子他爸走啊！可他不走，我们全家还得挨饿嘛！”

驶向香港的船飘走了，越走越远。黎桂康瘫坐在岸头，哭到最后连眼泪都哭不出来了，一个劲地自言自语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为什么。走的人都听说去香港能有饭吃，能吃上好饭，能赚钱回来养家糊口，说不准还能发大财。

这一年前后，广东东莞、深圳一带跑到香港的偷渡客据说有几十万人。若干年后，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又回来了。当年的公社书记黎桂康，后来当上了东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小平同志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使中国知识界沉浸在“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心情之中。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春天吧！”诗人郭沫若这样欢呼道。

在“科学的春天”暖风吹拂下，被骂了十几年的“臭老九”们从此昂首挺胸，以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干劲，投入到了四化建设之中。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将陈景润这样埋头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形象推到了全国各行各业面前，成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这一年4月，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然而人们在中央媒体上看到了两个很不相同的观点：一是“两个凡是”，二是“必须纠正‘文革’留下的一切错误的东西”。前者的话出自中央最高领导，后者的话代表着民意，也代表着小平等老一代领导的主张。

5月4日，时任党主席的华国锋访问朝鲜。11日回来的那天，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掀起党内和全国性的一场思想理论战线的大交锋，颇有些刀光剑影，结果是真理获得了胜利。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地位全面确定，改革开放和思想大解放运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7月6日，中央为广东、福建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后来广东人称它为“22号文件”，此文件引出的一个

叫“三来一补”名词，再后来这名词就变成了“引进外资”和“招商引资”的一场大革命）。

这一年，全国的农民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找着自己摆脱贫穷的出路。有一个农民的名字在当时根本没有人在意他，因为他仅仅是九亿多农民中的一个，如果说他比其他农民稍稍硬气一点的话，那他还是农民的小头目——中国最基层的大队支部书记。

他叫吴栋材。本书的主人公，时年四十三岁，职务：江苏省沙洲县南丰公社二十三大队（现为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一把手”。

1978年时的吴栋材，实在是个小人物，别说无法与安徽小岗村那十八位按手印、开创中国农民分田到户先河的农民英雄们相比，就连我父亲都远不如。我记得那年我父亲已经在自己的生产大队里办起了两个企业，一是绣花厂，二是眼镜厂。绣花厂有几十个年轻妇女，她们个个心灵手巧，绣的花都是供苏州出口的。能进绣花厂的青年妇女不仅可以不晒太阳，不沾泥巴，穿着“的确凉”衣服，在室内做干干净净的针线活儿，而且还能挣上比插秧、割稻、挑大粪等重劳力多一倍以上的工分——绣花工是发工资的，但钱不能到自己的手里，由厂里按数发到生产队，再折合工分后记在她们的头上，年底与生产队其他农民再进行分配。绣花女在我心目中是我那会儿一辈年轻男人们向往的找对象最佳群体。眼镜厂多数是男性农民工人，他们的收入也不错，可抵一两个绣花女的工资，分配方式与绣花女一样，先折合工分到人头，再参加本生产队的年终分配。眼镜厂和绣花厂的男女工人们最容易走到一起，他们的恋爱和成婚率非常高，父亲曾经也为我物色过他鼻子底下的一名绣花女作我对象，父亲的理由非常充分和有力，“人家的爹是苏州大厂子的工程师，居民户口，我们的厂全靠她爹的路子……”但当儿子的我，有些书呆气，坚决不干，非要跳出农门，出去“闯天下”。为此事，父亲曾经愤怒过我很长时间。虽说“私事”没办成，但父亲办的两个厂子却红火一时，我印象中当时连吴仁宝的华西村都有人来参观学习过。

吴栋材知不知道我父亲，我不清楚。但后来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华西的吴仁宝因为“偷办”小厂而受到过批评，受批评之后的吴仁宝心里装着自己那些一心想求富的农民们，结果他的厂子越办越好，现在成了“天